

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沈坤荣 金 刚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十三五时期,中国亟需寻求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可行的最优选择。本文首先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出发,阐释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必然性。继而论述了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非资本投入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地,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配置效率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总结了具体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路径。总而言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效率;技术进步;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3-0001-04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是当前社会各界迫切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但不可否认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一方面,从需求视角来看,出口方面,受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后主要国家再工业化的影响,出口呈下降趋势,并且我国出口更多的是加工贸易型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消费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劳动收入份额减少,并且受制于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使得城乡之间出现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投资方面,由于政府的垄断和行政干预,许多行业缺乏民间投资参与,主要依靠政府进行投资,而由于缺乏市场规范,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存在种种问题。另一方面,从供给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土地、制度及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因为较长时间一孩政策的推行,中国正

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人口红利消失,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再加上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以增加劳动和资本数量来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基本殆尽。而土地前期使用缺乏效率,又受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制约,未来土地租值上升趋势已不可逆,低地价吸引招商投资的模式也很难再持续推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

基于此,当前唯有从供给侧出发,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解决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不能被劳动和资本增加所解释的部分,一般包括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等方面。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首先,技术效率指应用当前已有技术的水

收稿日期:2016-03-24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研究”(编号:14ZDA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坤荣(1963—),男,江苏吴江人,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增长;金刚(1991—),男,江苏兴化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增长。

平,可以视为衡量创新技术产业化程度的指标。我国专利数量虽然在逐年快速上升,但是整体产业化水平还很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专利存在结构性问题,外围专利多而发明专利少,另一方面在于专利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匹配失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鼓励发明专利的创新,减少创新市场的失灵,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并且确保企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同时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形成便捷的知识扩散与共享渠道^[1]。

其次,技术进步指技术水平向最前沿技术逼近的程度。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主要凭借技术购买基础上的逆向工程式模仿创新来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但随着我国整体技术水平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继续通过技术购买等方式获取前沿技术的空间收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一方面,构建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的体制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研人员待遇,使得科研人员对未来有一个较好的预期,从而能够遵循创新的客观规律,脚踏实地专心从事科研,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营造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要避免产生与GDP崇拜类似的创新崇拜,实事求是地引导适宜性创新^[2]。另一方面,保护市场与企业家精神,避免行政干预,政府从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出发,给予企业家充分的自由,引导企业家从事持续创新而非其他投机行为。

再次,配置效率指要素配置与有效配置或最优组合的接近程度。受到体制制约,我国要素市场间长期存在流通障碍,使得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误配现象,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空间上的低效配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等要素实现了城乡间从无到有的流通,但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体制藩篱至今仍然在阻碍劳动等要素的有效配置,使得资源分配呈现畸形。此外,近年来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应政策引致了东部地区房价的过快上升,进而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3]。

因此,要想从供给侧出发,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需要在阻碍创新成果产业化、创新要素有效配置的环节进行体制创

新,并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水平,考虑到当前导致自主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体制痼疾,因此,体制改革就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进一步的问题是,体制改革具体改什么?中央提出了要简政放权、减少管制、破除垄断、改革国企、优化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等,从本质来看,实际上就是认识政府边界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职能分工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有由其根本性质决定的利益诉求,从而也都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对于政府来说,过去常常一味讲政府要做好“扶持之手”的工作,实际上是不够准确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4]认为的,政府常常是“掠夺之手”,只有在强调政府利益约束合理性的基础上,考虑民众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才更加现实且可行。而对于市场来说,作为“看不见的手”,市场并不能够包治百病,这已经被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市场失灵理论所证明。因此,二者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政府需要在保护市场、尊重市场的制度框架下承担应有的角色扮演。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新产业的增量发展,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处理好过去几年经济发展的存量问题。当前主要的存量问题在于过剩产能、弱势企业、积压房地产库存及相对较高的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在处理这些存量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梳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化解产能过剩。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不断降低,工业价格持续回落,PPI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滑,产能过剩是症结所在,其中主要的重化工产品如钢、水泥、玻璃等过剩最为严重。为什么会出产能过剩,理解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药方”。可能的原因是:其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能够保持一致的利益,有效促进了经济活力的释放,但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大动力去扩充税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从全国遍地开花的产业园区中就可可见一斑。其二,产能过剩并非总量上的过剩,而是结构性的过剩,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各种产品的质量也有越来越高的需求,而相应的产品供给却相当缺乏,直接催生了出国消费热、海外代购潮的现象。有研究显示,2013年以来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可见,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部分原因并不是缺少需求,而是供给与需求错配。

无论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还是供需错配,本质上都是政府过度行政干预市场的后果。未来的调整方向是可以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标尺竞争,但是要尊重市场规律,避免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对于一些不被市场所容纳的僵尸企业更要坚决淘汰,而不是强行输血维持其生存。考虑到处理“僵尸企业”可能会涉及到不良资产处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地方政府需要谨慎处理,至少做到:一是引导企业之间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等方式促进市场出清。二是政府要针对性出台相关的社会政策进行兜底,减少潜在的失业可能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尤其需要避免出现新的计划经济思维,“一刀切”地对所有产能过剩不加辨识地进行去除,对于那些可能仅是暂时的,可能被未来的需求所消化的,甚至可能孕育出国家竞争力的过剩产能要审慎对待,严格根据市场机制进行甄选,真正做到让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降低企业成本。当下中国企业制假造劣、肆意排污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无法承担高成本而向社会转嫁的结果,而企业之所以承担着高成本,政府的税负过重是主要因素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确实,以2014年为例,中国的宏观税负约为37%,已经进入高税负国家的行列。对此,中央正在加大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力度,未来有望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减负空间。在这一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的内涵,伴随着减税过程中税基的扩大,中央政府承担相应事务的能力并不会因此被束缚。税负是政府给企业带来的显性成本,可能相对容易解决,令人担心的则是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所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看起来相对隐性,解决起来可能更加棘手。事实上,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比较

严重,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劳工成本逐渐上升,一些加工制造企业为了避免制度性交易成本,宁愿舍弃国内业已发展成熟的配套基础而转向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办厂,使得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雁行模式”难以持续,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在顶层设计中体现出更多智慧,增加制度透明度,避免寻租空间滋生。

当然,除了政府从自身出发降低税负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外,还可以借助市场力量进一步拓宽企业降低成本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放松对最低工资的调控,根据市场情况将最低工资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并且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的市场壁垒,相应地,政府在建立统一、公平的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应该更有作为。其二,对影响物流、电力等上游行业和服务部门发展的体制进行改革,破除垄断,释放物流、电力等行业的市场活力。

第三,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库存积压属于产能过剩的范畴,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产能过剩,主要因为: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牵扯面广,水泥、钢铁、玻璃等行业与房地产行业一荣俱荣,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如果房地产库存长期积压,将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因此,降低房地产库存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问题,这表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如火如荼,房价一路走高,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有大量的成品房闲置。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识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够尊重市场规律,长久以来盲目地进行建设用地扩张,使得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因此,针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手段主要有:其一,必须在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形成长期消费预期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并且通过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另外,在去库存中应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第四,防范金融风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虽然存在各方面的风险,但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中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可以预期十三五及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要想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以往较高的增速已经不太现实,这就决定了前期经济发展中潜在的风险会逐渐凸显,甚至成为诱发危机的根源。其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金融风险,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在于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高企的杠杆率。在此目标下,重点从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入手,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券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等。

需要指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重构未来经济增长新动力最重要的一环,并且只有在处理好存量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形成新老交替的崭新局面。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纷繁复杂,即使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也难以有

效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十三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指导下,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拓展国内发展新空间。重点是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践行“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二是拓宽国际发展新空间。重点是借助“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金刚,于斌斌,沈坤荣. 中国研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J]. 科研管理, 2016(1): 68-76.
- [2] 余泳泽,张先轸. 要素禀赋、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管理世界, 2015(9): 13-31.
- [3] 陆铭,张航,梁文泉. 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提升了东部的工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5): 59-83.
- [4] [美]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 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M]. 赵红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黄明晴)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s by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EN Kunrong, JIN Ga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seeks potential and power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reform of supply-side structure is the best and most realistic choice.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necessity of choos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a policy, and the necessity of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ather th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progress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As a conclusion, clarifying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order to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is the key of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by enhanc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pply-side structure reforms;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ical progress; allocative efficiency